

邯鄲民俗風情

董海林 李广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董海林，男，1955年12月生，河北省邢台县人。研究生学历，研究员。河北省国学教育研究中心第一届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1969年5月参加工作，1972年12月参军，1985年8月毕业于河北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2001年7月毕业于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1987年以来，历任共青团邢台市委书记，中共邢台市委副书记，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政府区长，中共邢台市桥东区委书记，中共大名县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邯郸市峰峰矿区区委书记等职。现任邯郸学院党委副书记。

主要专著有：《时代的呼唤》（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感受温州》（200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感受邯郸》（201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等。主编有《邯郸文化脉系》（201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邯郸名胜古迹》（201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等。

邯鄲民俗風情



董海林 李广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序 言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民俗即民间的风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展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民俗是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民间文化。

—

就概念而言,民俗是一门针对信仰、风俗、口传文学、传统文化及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这也是学术概念上表述的民俗学。民俗学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生活现象息息相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对整个社会具有多大的意义,也不清楚自己在日常交流中所展现的一切对文化的传播和保存起了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有关人类活动的一切细节,都可以作为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谚语、谜语、绕口令、民间歌谣、史诗、家族制度,社会制度,婚丧嫁娶、祭祀、迷信、游戏、民间舞蹈、民族音乐、民间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灵魂转世、妖怪、占卜、巫术、民俗疗法、民间美术、民间饮食、民俗服饰、民间建筑等,都在其研究之列,而且其中包含和传达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此外,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对民俗事象的理论探索和阐释,对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研究与叙述,对民俗学方法论和民俗资料的收集保存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的探讨,并将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视为民俗学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对于民俗及其学问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并且拥

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中国历代学者积累了大量民俗资料,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学问的见解。大约成书于先秦至西汉的《山海经》,记载了丰富的神话、宗教、民族、民间医药等古民俗珍贵资料。东汉时期产生了专门讨论风俗的著作,如应劭的《风俗通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专门记述地方风俗的著作,如晋代周处的《风土记》,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等。隋唐以来,全部或部分记录风俗习惯及民间文艺的书籍更多。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俗学著作的诞生,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首次揭示研究歌谣的目的是文艺的与民俗学的。1928年初,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期刊和丛书,并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影响颇大。20世纪30年代初,杭州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并发展了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这方面的学术成就。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和著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绍原的《发须爪》,黄现璠的《吸烟风俗传播考》、《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以及黄石、闻一多等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论文。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北的民主政权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毛泽东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并指出民间固有文化的优点和对它学习的重要,因而在西北并扩及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搜集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潮,给“五四”以来这方面的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科学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民间文艺研究会”,进行采集、研究和组织队伍等工作,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和许多歌谣集、故事集。50年代后期,配合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俗学活动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不仅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一些地方也相继建立起民俗学团体。有些地区的博物馆还建立了民俗学部或开办了民俗学资料展览会。专业队伍日益扩大,相关论著屡屡推出,对外交流更加频繁,学者对民俗学理论方法的思考和探索持续深入,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不断增强,并主动参与学科间对话,积极谋求用自己富有特色的知识生产服务于民族文化事业的建设,从而使民俗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越来越被认可为整个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种盛世现象,它说明,民俗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关注,它不是仅仅停留在民间和百姓日常生活中,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正如我国一些现代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民俗大国。很早就有了采风问俗的政教传统,同时,有关民俗的记载和整

理工作在古代也有着显著的体现,……从《诗经·国风》、诸子百家之言,到两汉史书都有民俗的见解与民俗的记述,此后两千年间,无论是理论的民俗学,还是记录的民俗学,在学术上都有很多的积累。这种历代传衍的民俗记录和民俗解释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学术传统。”可以说,正是这一特定的学术传统,赋予了中国民俗学无论在发生学方面还是在学科设置方面都有别于西方民俗学的鲜明特征,也成为了构建中国民俗学派的重要依据所在。

二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迅速推进,在民俗学研究领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区域民俗文化的研究异军突起,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甚至于人们每到一地旅游,总要把民俗放在很高的位置。相对于自然风光、人文欣赏而言,民俗旅游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民俗文化的研究及其学科的迅速发展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还有一种与之不同的现象是,传统民俗在民众特别是在青年一代的日常生活中,日趋式微,且越来越让他们感到陌生,许多地方性民俗,你如果问问当地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很茫然地看着你,无以作答。传统民俗在广大民众生活中的实际失去或者发生的变化,正在深隐的层面上,说明着中国民众自我身份的日渐模糊。研究民俗,不是将民俗置入博物馆供人参观、怀旧,而是研究我们今天民众的真实的生存、存在形态,并在这一研究中,重新确认中国民众的自我身份。

正因为如此,当传统民俗离我们今天渐行渐远之际,我们首先是要梳理、澄清传统的民俗形态是什么,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还要因此站在今天,从今天的维度出发,看看这些传统民俗还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存活多少,失去多少,何以存活,又何以失去,从而说明我们今天的存在形态,确认自己的身份,并进而判定我们今后将要向何处走去。

这说明,无论是站在文化发展的层面还是站在时下年轻人的思想意识方面而言,开展对于区域民俗的研究无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专制集权文化一向占据着统治位置并作为负能量影响着我们的存在,这是人所共知的不争的事实。但民俗的区域性,却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作了解构作用。民谚云:深山出俊鸟。其中的道理也正在于深山是专制集权难以深入达到的地方,从而给生命的自由实

现以更多的可能,让生命以不同于专制集权文化“强塑”下的生命形态的形貌出现。正是民俗的区域性,使不同的生命形态、风貌,有了突破专制集权文化束缚而存活的可能,并因而实现了如同美丽的大自然一样的多姿多样性。马克思曾经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是这样,人的生命形态更是这样,而民俗的区域性,则在这个方面提供了正能量。

在文化概念中,存在着弱势区域文化与强势区域文化的差异。就区域民俗文化而言,一般说来,经济强势的区域,其文化亦为强势文化,反之亦然。弱势区域文化在面对强势区域文化时,往往以强势区域文化作为自己学习、效法的榜样,从而失去了自身的民俗文化。譬如,我国现在有些人对西方的情人节、平安夜、玫瑰花,对西方人的衣饰打扮、待人接物、礼仪举止的重视,超过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表现的重视。同类的学习、效法,有时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这就是西方后现代所说的“东方主义”,即东方究竟是东方人的东方,还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问题。譬如,当西方赞美中国传统的乡土人情、风物风情,如农家小院、四世同堂、乡间野景、北京胡同等等时,中国民间也就会将此视为难得的美好而倍加重视,如果没有西方人的赞美,则未必如此。弱势区域文化与强势区域文化这样的关系,是需要我们给以相当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的。

三

解读区域民俗风情,应该用先进的现代理论对区域民俗进行价值观照,以解其“神”的“密码”,打开其“神”的“黑箱子”,这在当前是区域民俗研究中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很多人之所以认为研究区域民俗只是搜集民间史实,没有学术思想深度的误解,显然与此有关。这也向每一个民俗研究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使我们的传统民俗研究走向新的高度,提升理论价值和价值观念,多出成果,多出精品,就成为当前民俗研究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在这里,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这本书的主编董海林、李广两位学者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试图运用相关的现代理论来研究邯郸的区域民俗现象,不仅梳理了某种民俗现象的来龙去脉,而且在价值层面上也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并且这种探讨有一定的深度,这是一个新的突破,也是这部著作的难能可贵之处。

这部书的意义还在于对历史民俗的整理与挖掘。传承性是民俗的根本特性,任何一种民俗事象在当下的形态都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因而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应该注意它的发生、持续和变化,都不能忽略它在历史上的存在状态。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这段话同样适应于民俗研究。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民俗研究,就不能不对我国历史民俗文献的分布、不同种类的历史民俗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民俗文献作为研究资料的真实性及其字句文义等有全面准确的把握,而这必然有赖于用现代民俗学的眼光对历史民俗进行专门研究,必须做细致的甄别、校勘、辨伪、注释、辑佚等工作。因此,深入挖掘民俗历史并进行系统总结,不仅是中国民俗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有利于对中国现代民俗发生的理解,乃至可以为中国民俗学在未来的发展提供某些借鉴意义。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经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现代化、城市化、商业化的进程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生发于、成长于、适应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民俗文化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现代化工业社会产生出来的新需求表现出种种的不适应性,另一方面意味着大量新风的涌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总体上人们一方面热衷于树新风,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民俗传统的不适应性,忽视了它具有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民俗传统被武断地置于现代性的对立面,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遭受贬抑乃至“革命”,处于不断弱化和边缘化的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中国开始的思想解放,社会变革和生活自主性的增加,传统民俗又重新以光明正大的姿态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更给予了传统民俗复兴的理由和契机。在这种情况下,以地方性为基本特征,具有重要认同价值的传统民俗,就得到重新评估和强调,复兴的态势也愈发猛烈起来,在国家层面也启动了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这样一种时代环境之中,如何从整体上看待民俗文化,不仅关系着当代的民俗文化建设,也关系到民俗学科在未来的生存发展问题,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引导民俗文化研究向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推动民族文化的进步。

是为序。

2013年5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基本概况	(1)
第一节 地理位置	(1)
第二节 自然地理	(1)
第三节 人文环境	(3)
第四节 历史文化	(6)
第五节 人口状况	(10)
第六节 姓氏	(11)
第二章 家庭习俗	(15)
第一节 家庭结构	(15)
第二节 家庭及亲友称谓	(22)
第三节 传统家风	(24)
第三章 生活习俗	(26)
第一节 饮食	(26)
第二节 服饰	(40)
第三节 居住文化	(51)
第四节 出行文化	(56)
第四章 婚丧庆祭习俗	(62)
第一节 婚嫁	(62)
第二节 丧葬	(95)
第三节 生育	(119)
第四节 过嗣	(131)
第五节 寿庆	(132)
第六节 祭祀	(134)
第七节 建房	(136)
第八节 禁忌	(138)
第五章 节日习俗	(144)
第一节 传统节日	(145)
第二节 现代节日	(202)

第六章 交往习俗	(218)
第一节 问候	(218)
第二节 尊称	(222)
第三节 待人	(231)
第四节 走亲戚	(232)
第五节 邻里交往	(235)
第七章 社会风气	(237)
第一节 新风	(237)
第二节 陋习	(239)
第三节 重视风气建设,打造良风美俗	(241)
第八章 信仰	(253)
第一节 民间信仰	(253)
第二节 会道门	(266)
第三节 宗教信仰	(283)
第九章 方言	(311)
第一节 语音	(311)
第二节 语汇	(320)
第三节 语法	(379)
第十章 熟语	(394)
第一节 歇后语	(394)
第二节 谚语	(424)
后记	(463)

第一章 基本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

邯郸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和中国成语典故之都,国务院批准的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和市区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级别城市。

邯郸市位于河北省南端,地处东经 $114^{\circ}03' \sim 40'$,北纬 $36^{\circ}20' \sim 44'$ 之间,西依太行山脉,东接华北平原,与晋、鲁、豫三省接壤,现辖 4 区(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1 市(武安市)、14 县(邯郸县、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肥乡县、永年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曲周县、魏县、馆陶县),总面积 1.2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963.5 万人。

邯郸区位优势条件优越,位于晋、冀、鲁、豫四省要冲和中原经济区腹心,在四省交界区是唯一的特大级别城市,与石家庄、太原、济南、郑州四个省会城市的距离均在 200 公里左右,与北京、天津等大都市的距离均在 500 公里以内。邯郸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为我国三大经济圈所环绕,东进与长三角经济圈相接,南下可与珠三角经济圈联系,北拓与环渤海经济圈近邻。

邯郸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便利,纵穿中国南北的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大广高速公路、106 国道、107 国道与横贯祖国大陆东西的长治—邯郸—济南—青岛铁路、青兰高速公路和 309 国道交会于邯郸,境内形成了“五纵五横”的干线公路网络,邯郸机场于 2008 年通航,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干线机场。在四省交界区域中,唯有邯郸具备铁路交叉、国道交会、高速纵横过境和航空港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条件。

第二节 自然地理

邯郸市地处中朝准地台的华北拗陷和山西台背斜二级构造单元的复合结合部。出露地层自西向东由老到新、依次为太古界赞皇群元古界震旦系,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石灰系、二迭系,中生界三迭系,新生界第三系和第四系,除石灰系、二迭系、第三系地层大部被第四系地层覆盖外,其他各时代

地层出露良好,具有比较完整的剖面。本区岩浆活动以侵入为主,岩体侵入为南北向和北、北东向,似层状侵入于奥陶系或二迭系地层中。在漫长的地史时期,境内经历了多种构造体系的复合和干扰作用,致使构造类型复杂多样,主要构造为燕山运动时期的产物,以断裂为主,褶皱次之,伴有多期的岩浆活动,因而形成了太行山台背斜、鼓山背斜、和村向斜等褶皱和邯郸断裂、紫山鼓山断裂、武安断裂、刘家河断裂、土木河井店断裂等大中小型近千条断裂构造。由于断裂挤压、褶皱和中生代凹陷的影响,构成了华北沉降带、康二城峰峰地垒、武安彭城断陷盆地、贺进徘徊地垒等上升与下降地质块体。同时,由于岩浆活动形成了多处南北向串珠状的浅成一中浅成火成岩侵入体,构成了邯郸市地质与地貌的基本骨架,燕山运动以后,西部山区不断遭到剥蚀夷平,东部下沉不断接受堆积。以上各形迹在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又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由于强烈的构造运动、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和外应力地质作用的综合影响,在境内形成了种类繁多、储量可观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基础。

邯郸市位于全国地势分区中的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太行山和华北平原的交会处。其地势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下降,高差悬殊,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以京广铁路为界,西部为中、低山丘陵地貌,东部为华北平原。海拔最高 1898.7 米,最低 48.7 米,相对高差 1850 米,总坡降为 21.4‰。按地貌形态,全市自西向东大致可分为五级阶梯:西北部中山区、西部低山区、中部低山丘陵区、中部盆地、东部洪积冲积平原区。

邯郸市境内山脉,属太行山余脉,主要分布在武安市、涉县、邯郸县、峰峰矿区、磁县之内。其中有老爷山脉、小摩天岭山脉、十八盘山脉、横行诸山脉、鼓山、紫山脉、神麋山脉以及少量平地突起的山峰。

邯郸市的水文分地表水与地下水两部分。地表水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及其由泉眼涌出形成的滏阳河基流,此外还有部分过境客水。全市年径流总量为 2.39 亿立方米,径流深 85.9 毫米,河流、水库、坑塘水域面积为 43699 亩。

邯郸市的河流属海河水系,由于地面坡度很大,降水集中,河川较为发育。流长超过 10 公里的河流有 10 条,总长 402.6 公里。大多发源于西部山区,自西流向东或东北。以鼓山主峰向西,以及鼓山至紫山隆起带为分水岭,东南主要为滏阳河流域,西北主要为洛河流域。

邯郸市的地下水,由于地质构造与地貌条件的差异,形成不同类型的潜水区域。主要有西北部坚硬岩裂隙潜水区、中部可溶岩类岩溶裂隙潜水区,

武安盆地第四系岩层裂隙水和孔隙水压水,中部闪长岩、砂岩、页岩裂隙水区,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孔隙水区。

邯郸市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风多干旱,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温和凉爽,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 13.5℃,最冷月份(1月)平均气温 -2.3℃,极端最低气温 -19℃,最热月份(7月)平均气温 26.9℃,极端最高气温 42.5℃,全年无霜期 200 天,年日照 2557 小时。

邯郸境内自然植被类型可分为针叶林、阔叶林、灌木丛和灌草丛、草甸、沼泽植被、水生植被 6 种类型。邯郸市的森林植被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草丛植被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区的沟谷和荒坡,草甸植被则遍布全境,沼泽植被和水生植被主要分布在东部滞水洼地。亚热带树种漆树在西部山区有着广泛分布。领春木和太行花为邯郸市特有的植物物种。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植物分 121 科 1146 种,其中栽培植物达 150 种。邯郸栽培植物资源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稻谷、棉花、花生等,素有“冀南粮仓”、“冀南棉海”美誉,是全国主要的粮棉、禽蛋、蔬菜生产基地,主要土特产品有核桃、柿子、花椒、鸭梨、大蒜、辣椒等。

邯郸市野生动物主要为陆栖脊椎动物,其中马类较多,两栖类、爬行类和兽类较少。较大的兽类几近绝迹。哺乳类有豹、狼、狐、獾、狸、野兔、黄鼠狼、刺猬、水貂等。鸟类有麻雀、鸽、喜鹊、燕子、猫头鹰、雕、雉鸡、石鸡、乌鸦、鹌鹑、啄木鸟、布谷鸟、画眉、黄鹌等。鱼类有鲤鱼、草鱼、鲫鱼、鲢鱼、泥鳅、青鱼等。爬行类有龟、鳖、壁虎等。

邯郸蕴藏有种类繁多的矿产资源,是全国著名的煤和高品位的铁矿石产区,拥有丰富的“两黑”——煤、铁资源,煤炭和铁矿石储量分别达到 40 亿吨和 4.8 亿吨,被誉为现代“钢城”、“煤都”。其中煤炭储量丰富,煤种齐全,煤质较好;铁矿品位高、有害杂质少、可选性好。此外,还有较为丰富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如铝矾土、耐火土、硫铁矿、含钾砂页岩、碳石等 40 种以上矿藏。各种矿产地 200 处。

第三节 人文环境

邯郸历史悠久。“邯郸”之名,最早出现于古本《竹书纪年》。战国币铭文有“甘丹”。邯郸地名的由来,现以《汉书·地理志》中三国时魏国人张晏的注释为源:“邯郸山在东城下。单,尽也。城廓从邑,故加邑云。”意思是说,邯郸的地名源于邯郸山,在邯郸的东城下,有一座山,名叫邯山,单,是山脉的尽头,邯山至此而尽,因此得名邯单。因为城郭从邑,故单旁加邑(卩)

而成为邯郸。邯郸二字作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国地名文化的一个特例。

传说上古时期,人类始祖女娲就在邯郸古中皇山抟土造人、炼石补天。一万多年前,新石器早期的磁山先民就在这里繁衍、休养生息,开启了农业文明的新纪元。

邯郸的城邑,肇起于商殷。在商代早期建都于邢(今邢台),后迁都于殷(今安阳)的数百年间,邯郸均为畿辅之地。古本《竹书纪年》中,就有商末殷纣王在邯郸建“离宫别馆”的记载。至迟在殷纣王时期,邯郸一名就已经出现,证实邯郸古城距今已有 3100 多年的建城历史。

邯郸之域在西周时属于卫国,春秋时为晋地,当时邯郸已是闻名遐迩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著名城邑。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 500 年),晋国正卿赵鞅(赵简子)已将邯郸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此,邯郸便成了赵氏的世袭领地。战国时,赵敬侯元年(公元前 386 年)将赵都自中牟(今河南鹤壁西)迁徙到邯郸,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历经 8 代王侯,延续了 158 年的繁华时期。特别是一代明君赵武灵王,开改革之先河,实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富国强兵,国势大盛,雄踞战国七强之列,使赵国成为可与强秦抗衡的国家之一。

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 228 年)秦军破邯郸,赵王迁降秦,邯郸属秦国,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秦灭赵国。次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邯郸是邯郸郡的首府。汉高祖四年(公元前 203 年)立张耳为赵王,都城仍设于邯郸。九年,刘邦封其爱子如意为赵王,并重建邯郸宫城,富丽堂皇的温明殿即建于此时。一直到西汉后期,邯郸城有“富冠海内,天下名都”之称,是除国都长安之外,与洛阳、临淄、成都、宛(南阳)齐享全国五大都会盛名,从战国到东汉,邯郸兴盛长达 500 年之久。

东汉末叶,豪强并起,割据混战,邯郸罹难兵燹灾祸,开始走向衰落。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 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国公,于邺城建都。在经济上实施屯田安民,大兴水利,营建魏都,开修道路。魏都的营建,以中轴为对称法则著称于世,并修建了铜雀、金凤、冰井三台。西晋左思所作《魏都赋》,正是描写邺城此时的繁华景象。邯郸此时沦为普通的县城,隶属于魏郡。三国魏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邯郸属广平郡,东晋后又改属魏郡。代之而勃兴的魏都邺城继而先后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前后历时 364 年,对于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隋唐时,邯郸先后归属或复辖为洺州、磁州、武安郡和紫州,衰落而成蓐尔小县。曾盛极一时的邺城亦被焚为废墟,城毁人迁,一蹶不振。而邯郸东

部的大名却在唐五代时悄然兴起。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作为魏州首府的大名已发展成为黄河以北较大区域的中心城市。公元 758 年,大名建为魏博镇,后称魏州大名府。五代时,在大名设天雄军节度使。公元 923 年,李存勖在魏州(今大名)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后唐庄宗。

宋王朝建立后,宋太宗将天下分为十五路,邯郸县属河北路磁州,而大名为河北路治所(省府)。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 1042 年),建大名为陪都,称北京。大名至馆陶一带,是宋辽交兵的古战场,这里曾演绎过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到金朝时,大名曾为藩国大齐的都城,公元 1130 年刘豫在此称帝。至元朝,这里仍为大名路总管府治,依然是邯郸东部的繁华重镇。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在全国设置十三省,邯郸县属北直隶省广平府。清朝因袭明制称直隶省,邯郸县仍属广平府管辖。明清时期邯郸一带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在广平府城(今永年老城)。民国初,废广平府,邯郸县属直隶省冀南道,1928 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邯郸县直归省辖。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邯郸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刘伯承、邓小平率八路军 129 师转战千里太行,创建了以邯郸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从此奠定了邯郸作为晋冀鲁豫四省接壤区域中心城市的基础。1945 年 10 月 5 日,邯郸城获得解放,从此这座饱经沧桑、历尽三千年盛衰荣辱的古城终于换了人间。邯郸解放后,邯郸县城始建为邯郸市,直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政府设在邯郸市)。1949 年 3 月,撤消邯郸市,降为邯郸镇,同年 8 月,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设立了邯郸专区,邯郸镇划归河北省邯郸专区管辖。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邯郸镇仍为邯郸专区专署驻地。1952 年 12 月 22 日,邯郸镇复升为邯郸市。1954 年改省辖市。1956 年峰峰市并入邯郸市。1983 年邯郸县并入邯郸市。1984 年改为省辖市。1986 年武安县(后改市)划归邯郸市。1993 年,经国务院批准,撤消邯郸地区,实行地市合并,将邯郸地区所辖各县划归邯郸市管辖,称邯郸市。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邯郸已由解放初期一个人口不足 3 万的小镇,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城市人口超百万的新兴繁华都市,在毛主席当年预言的“邯郸是要复兴的”道路上,正一步步走向辉煌!

悠久的历史,赋予了邯郸光辉灿烂的文化,也为古赵大地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名胜古迹。据资料显示,邯郸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全市共有文物遗存点 5000 余处,成为河北省和全国名副其实的文物资源大市。截至到 2013 年,在这些重要的文物遗存中,目前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4 处,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22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05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00 余处。其中有许多古迹蜚声海内外,诸如磁山文化遗址、赵邯郸故城遗址、邺城遗址、武灵丛台、响堂山石窟、娲皇宫及石刻、北朝墓群等。邯郸还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红色旅游胜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旧址等,构建起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景观。此外,由于邯郸独特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在其境内还遗存有众多的自然景观。

第四节 历史文化

邯郸历史悠久,铸就了其辉煌灿烂的文化底蕴。邯郸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邯郸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并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现象,这是先人留给邯郸后代子孙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正是这些财富和资源,构筑起了邯郸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成为邯郸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是邯郸一笔独具特色的无形资产和巨大财富,是邯郸的“根”和“魂”,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资源,对推动邯郸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邯郸历史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女娲文化:在涉县的古中皇山上坐落的娲皇宫,传说是华夏始祖女娲氏“炼石补天,抁土造人”的地方。娲皇宫因此而得名。因女娲抁土造人,又是人类的创造者,故被世人尊称为“华夏祖庙”。娲皇宫建造在悬崖峭壁上,阁楼高悬,构造奇巧,被称为河北古建筑十大奇观之一。从娲皇宫开凿的石窟和摩崖刻经考察,它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距今已有 1450 余年,后历代相继扩修,逐渐形成今日的规模。相传农历三月十五日为女娲的诞生之日,每当此时举办娲皇庙会,来自周边数省的游客云集此地祭祀女娲。千百年以来,流传在这里的民风民俗、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形成了丰富的神秘文化,在中原大地远近闻名。以娲皇宫为代表的女娲文化,展现了女娲在洪荒之世,与自然抗争、改造自然、造福苍生的不屈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磁山文化:磁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是我国以粟作农业和定居生活为特点的原始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表现出人类利用自然、与自然相融合的奋斗精神,因最早发现在武安的磁山遗址而命名。经科学测定,距今已有 8000 多年的历史。1976 年开始考古发掘,出土陶、石、骨、蚌器 5000 多件和大量家禽家畜、胡桃等动植物标本,还发现了炭化的粟约 10 万

余斤,磁山被确认为是世界上粮食作物——粟的最早发源地,还是中国家鸡和中原核桃最早的发现地。农作物“粟”(谷子)、家鸡和胡桃(核桃)三大发现,不仅反映了磁山先民在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改写了我国乃至世界粟作农业、家鸡驯养和核桃产地的历史。以陶质平底孟、鸟头形支脚为特点的生活用具,以石制斧、铲、磨盘、磨棒为特点的农耕和脱粒工具,以长方形坑穴为特点的粮食窖穴,以陶、石器“组合物”为特点的祭祀遗迹等,构成了磁山文化独特而丰富的内涵。磁山文化被誉为“中华瑰宝”,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赵文化:以“胡服骑射”为代表的赵文化,其基本内涵为开放、进取、包容,展现出赵国在逐鹿中原时所表现出的改革创新精神。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源头之一,是华夏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会、融合和升华的结晶,具有中原华夏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构成的二重性,集中反映了北方地区诸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她丰厚博深、魅力四射、光彩照人,是邯郸地域文化中的代表。赵文化滥觞于春秋,兴旺于战国,延续至两汉,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至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这里产生了发达的冶铁、制铜、制陶等手工业,形成了繁荣的城市商业贸易,孕育了荀子、公孙龙、慎到等一代学术大师,涌现出赵武灵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慷慨悲歌的英雄人物。它与燕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概貌。赵文化其主流内涵是“开拓进取,竞争图强,兼收并蓄,改革创新”,贯穿其中的以人为本、广揽贤才、团结向上、忠勇报国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曹魏建安文化:位于临漳县西南的古邺城遗址,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东汉末年至隋统一的400年间,为北方著名的古都,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相继在此建都。战国时期因西门豹治邺而显名于世,东汉末年孕育出了文学史上璀璨的“建安文学”。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在邺城聚集了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人集团”,辞赋慷慨,谈诗论文,开一代风格刚健、情调激越之文风,留下了大量的词赋文论作品,在中国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地处黄河之北的邺城,散布在漳河之滨的百余座东魏北齐皇陵和众多的寺庙遗址,书写着它曾经的辉煌。铜雀三台和邺城的建筑格局,对隋唐长安都城、元大都(北京城)、日本奈良城乃至后世的都城建筑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以邺城为依托的建安文化,是建安文学的摇篮,民族融合的结晶,中国文化史的奇观。

北齐石窟文化:以响堂山石窟和娲皇宫石窟为代表的北齐石窟文化,是